

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智慧及启示

张小锋^[1]

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；北京 100029）

赵武灵王（公元前 325—公元前 299 年）是战国时期一位重要的改革家，他顺应历史潮流，学习先进经验，讲究策略方法，在赵国推行以“胡服骑射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，不仅改变了赵国孱弱的地位，而且对战国乃至其后各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成功推行改革的过人智慧对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于启迪意义。

一、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在列强竞起、赵国孱弱的背景下拉开的

一方面，战国时期，诸国因变法而日强。公元前 445 年，魏文侯即位任用李悝变法；公元前 400 左右，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；公元前 356 年齐威王即位，旋即变法图治；约公元前 354 年，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；公元前 359 年秦孝公用商鞅实行变法。各国变法成效明显，特别是秦商鞅变法彻底、持久，从而为秦国的经济腾飞和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基础。

另一方面，赵国国力孱弱的现实亟需改变。赵国忝列“战国七雄”，雄踞东方，《战国策》卷 19《赵策二》云，赵“地二千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。”但是，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复杂性，随着日月的推移、时局的变化，曾经强盛的赵国已颓势日显、雄风不再。

公元前 353 年，魏国攻伐赵国，围其都城邯郸，赵国难以御敌，只好求助于齐，幸赖齐将田忌、孙臏率军相救，用“围魏救赵”之计，大败魏军，才摆脱危局。公元前 326 年，赵肃侯卒，秦、楚、燕、齐、魏五国均派出上万人精锐部队会葬，这既反映出列强对赵的觊觎之心，又显示各国军事实力之强大。赵武灵王九年、十年、十三年，赵国曾先后参与对外战争，但屡尝败绩。公元前 323 年，魏将公孙衍联合韩、魏、赵、燕、中山五国发起“五国相王”（即五国相互承认为王），“合众弱以攻一强”，欲以“合纵”之策对抗秦“连横”之术。《史记》卷 43《赵世家》记载“五国相王，赵独否，曰：‘无其实，敢处其名乎！’令国人谓己曰‘君’。”赵武灵王拒绝称“王”，而是理性地称“君”，这虽是他审慎务实的秉性所致，也透露出赵国国力孱弱的残酷现实。

事实上，赵武灵王秉政赵国之时，内外形势十分严峻。赵国作为“四战之国”，列强环伺，诸侯压境，胡骑骚扰，四面受敌，其西有国力雄厚、虎视眈眈的秦国，其东有经济富足、人才辈出的齐国及与齐国结盟的中山国，其北有剽悍善战、惯于掳掠的游牧民族“三胡”（林胡、楼烦和东胡）。特别是中山国三面与赵国毗

连，构成赵国的“腹心之患”；林胡、楼烦则连年南下侵扰。赵武灵王如果不能解除强敌谋赵的严重威胁，则面临着被他国兼并攻灭的下场。

二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伴随着激烈的争论推进的

赵武灵王初即位，由于年少，“未能听政”，直到十九年（公元前302年）春，才“大朝信宫”，议定改革。他认为：“阴阳不同道，四时不一宜”，天地、四时是不断变化的，人类社会也是不断进步，所以古代帝王的统治方法都不相同。如“伏羲、神农教而不诛，黄帝尧舜诛而不怒，及时三王，观时而制法，因事而制礼。”因此应制订适合时宜的政策，不应该因循守旧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赵武灵王下定了改革的决心。

在大政方针确定后，如何改？怎样改？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。为此，他在与群臣集议之后，率领轻装队伍奔赴临近中山国的边境作实地调查，详细了解边塞的形势和民情风俗，特别观察游牧的胡人部落。他看到习惯于“在马背上生活”的胡人，行动灵便，身穿短衣、长裤，上下马方便灵活，开弓射箭，运用自如，往来奔跑，迅速敏捷。相比之下，赵国的军队虽然武器精良，但以兵车为主、步兵配合，行动迟缓；官兵们身穿长袍，甲靠笨重，结扎繁琐，对骑马射箭十分不便。于是他产生了改革官兵服装，脱掉长袍重靠，改穿短衣、长裤和皮靴的想法，返回邯郸后下令赵国的军队“著胡服，”也就是身穿短装，使用带钩束腰皮带，足登皮靴，以方便骑马射箭。

胡服骑射的命令下达后，引起了保守派的怨恨和反对。赵武灵王的叔叔奉阳君是顽固派的首领。他信奉儒学，认为中国是礼义之邦，反对著胡服。《史记》卷43《赵世家》记载，赵武灵王“使王綰告公子成，寡人胡服，将以朝也，亦欲叔服之……使綰谒之叔，请服焉。”但遭到拒绝，并派使者回报曰：“臣闻中国者，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，万物财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异敏技能之所试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义行也。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，变古之教，易古人道，逆人之心，而怫学者，离中国，故臣原王图之也。”赵武灵王亲临府门，婉言开导，晓之以义，喻之以利，阐明此举旨在“利其民而厚其国”，也是为了实现先王遗志，昭雪国耻，抵御强暴，最终说服了奉阳君。第二天奉阳君穿着胡服来上朝，赵武灵王在激动之余立即下令：赵国军队全体官兵一律“著胡服”。

胡服推行中，又遭到了旧贵族赵文、赵造、周绍、赵俊的抵制，“皆谏止王毋胡服，如故法便。”赵武灵王逐一说服。他任周绍太子太傅，让他著胡服戎装，以此来影响太子。最顽固的赵燕始终不肯低头，赵武灵王给予严厉批评。《战国策》卷19《赵策二》记载：“寡人胡服，子独弗服，逆主罪莫大焉。以从政为累，以逆主为高，行私莫大焉。故寡人恐亲犯刑戮之罪，以明有司之法。”最终，赵燕终于妥协了。在攻破原阳“以为骑邑”时，将军牛赞进谏曰：“国有固籍，兵

有常经。变籍则乱，失经则弱。今王破原陽，以为骑邑，是变籍而棄弃经也。且习其兵者轻其敌，便其用者易其南。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，是损君而弱国也……臣恐其攻获之利，不如所失之费也。”赵武灵王又耐心说服牛赞，使之欣然接受。反对声音和各种阻力均一一化解。公元前 302 年，赵武灵王“命将军，大夫、适（嫡）子、代吏皆貂服”，貂服即胡服，胡服骑射进一步推广开来。

三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采取了巧妙的策略、争取了更大的支持。

为了稳妥推进改革，赵武灵王采取了巧妙的方法。首先与肥义谋议、接着是与楼缓谋议，得到了两人的全力支持。为了赢得更多人的支持，他在“信宫”讨论五日，充分听取了大臣意见，同时也是进一步赢得了大臣支持，凝聚了改革的共识。其次，他注意树立典型，通过榜样示范，带动大家。最先是他自己带头著胡服，以身作则，起到示范引领、上行下效的作用。“吴王好剑客，国人多创痍；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”接着是争取各派领袖的支持。善于团结各方力量，特别是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力量，是赵武灵王的过人之处，如前文所述，他先后争取了叔叔奉阳君的支持，接着是得到了太子太傅周绍的认可，让他们二人带头穿胡服，起到了引导垂范的作用。当然，对最顽固的反对人物，则严词斥责，亮出底线，如拒不从命，将动之以刑，表明自己推行改革的坚定决心。第三，在步骤策略上是稳步推进，循序渐进，而不是一下子全盘推出。先是“吹风”改革，接着是率军赴邻国边境实地调查，再接着是集体讨论凝聚共识，分步赢得各方支持，最后才是大规模推开，这样就减少了改革中遇到的阻力。在实际推行中，先搞小范围试点，再全国大规模推广，如攻占原阳后，率先在这里建立胡服骑射的试点和骑兵训练基地，《战国策》注云：“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，盖始教一邑，然后行于境内。”采用如此稳妥的步骤，便于改革的顺利推行。

四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选择了合适的时机。

历史昭示：一个大国的衰落就是另一个大国崛起的天赐良机；只要智者才能感知并及时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。

公元前 314 年，秦攻取了魏焦、曲沃，又败韩军于岸门，韩、魏两国先后屈服于秦。不久，出现了秦、韩、魏三国和齐、楚两国两个对立集团。公元前 312 年，由于楚进攻韩的雍氏，两个集团间的大战再次爆发。同年，赵国藺地陷于秦，将军赵庄被俘，但赵未介入集团间的鏖战之中。这样赵国便获得了个相对稳定的形势，对推行改革十分有利。更为难得地是，公元前 307 年，秦国发生了持续三年之久的君位争夺内乱，不得不停止对外攻伐兼并的脚步。这种相对和平的外部条件，为赵国拉开改革大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，赵武灵王睿智地把握住了这个契机。[\[2\]](#)

赵武灵王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，一直为后人所称颂，梁启超称其为“黄帝以后第一伟人”。^[3]他成功推行“胡服骑射”社会改革给后世留下诸多启示：第一，改革要顺应历史潮流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奴隶制逐渐瓦解，封建制度逐渐形成，社会处于大变革、大转型时期。各国的统治者为适应这种形势的转变，与时俱进，或变法，或改革，从而使这一历史时期呈现出生机盎然、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。各国的变法和改革的史迹昭示人们：顺应社会潮流、与时俱进、变法改革者，其国势必昌；先变法者国力先强；小变者小强，大变者大强，变法最彻底者，最终成为诸国中一统六合之最强者。^[4]“世界潮流，浩浩汤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”赵武灵王正是看到时代发展的趋势，顺应了历史潮流。第二，改革要善于抓住有利时机。第三，改革需要稳妥的步骤、巧妙的策略。第四，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要有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志向和不畏艰险的魄力和毅力，同时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这些启示，在我国全力推进“全面深化综合改革”战略的今天，显得弥足珍贵。

五、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

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，赵国军队战斗力日益增强，一跃成为与秦、齐相提并论的军事强国。赵武灵王十九年，进击中山，“北略中山房子”。赵武灵王二十年，“王略中山地，至宁葭。西略胡地，至榆中。林胡王献马。”赵武灵王二十一年，兵分两路，进攻中山，“中山献四邑”。赵惠文王三年，“灭中山，迁其王于肤施。”从赵王灵王首伐中山，先后六次攻伐^[5]，卒灭中山，终于解除了“腹心之患”。同时，还攻破林胡、楼烦，占领了大片土地，设立了云中、雁门、九原郡。林胡、楼烦慑于赵的威势，向北移迁。自赵武灵王而后，赵国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军事实力，成为关东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军事大国。

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仅对赵国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，而且对其他诸国和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第一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胡服骑射改变了作战方式，宣告了骑战时代的到来。尽管骑兵早已有之，但大规模、正规化骑兵兵种使用的开始，是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开端的。过去战争是用兵车作战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，战争方式渐渐从车战转化为骑兵作战。赵武灵王虽然不是骑战的创始人，但却是第一次把骑兵提到军队的主力地位的第一人，从此我国由车战时代跨进了骑战时代。

第二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中国服饰史、风俗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。胡服骑射影响和改易了人们的行为习惯，特别是赵武灵王推行“著胡服”，对中国历代服饰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王国维先生考证说：“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王……其服上褶下袴。此服之起，本于乘马之俗，盖古之裳衣本乘车之服，至易车而骑，则端衣之联诸幅为裳者，与深衣之连衣裳而长且被土者，皆不便于事，赵武灵王之易胡服，本为习骑射计……此胡服行于中国之略也。”^[6]胡服轻便，不仅便于将

士行军、作战，也便于人们起居、劳作，这种服饰后经北魏、唐略加改动，但基本款式未变，成为正式的官服。

第三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民族文化交融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。胡服骑射赋予了“华夷之辨”以新的内容^[7]，开创了汉民族学习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先例，推动了胡汉文化相互借鉴、相互交融。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，有过无数次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，由此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辉煌璀璨的中华文化。其中，中原华夏（汉）民族的农耕文化同北方戎狄（胡）各族的游牧文化的频繁交往，构成了贯通我国民族文化交融史的主线。^[8]

^[1]作者简介：张小锋（1971——），博士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党委宣传部部长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、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化政策、文化产业研究。

^[2]参见彭聚林《赵武灵王军事改革成功的原因》，《军事历史》，1988年第3期。

^[3]梁启超《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》最早发表于1903年11月2日《新民》，《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，2003年第2期。

^[4]关于各国变法情况，笔者在《百家争鸣》第四章《与时俱进的社会改革》一书有阐述，可参看。中华书局2010年。

^[5]关于赵攻中山的详细过程，参阅何清谷《试谈赵灭中山的几个问题》，《人文杂志》，1981年第2期。

^[6]王国维：《胡服考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第二十二中华书局，1959年版。

^[7]金久红指出：胡服骑射“冲破了传统华夷之辨中只能以华化夷的固定范式，客观上承认了夷人的长处，将华夷之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”经过胡服骑射，“民族间的经济、文化乃至民族性格却得以相互借鉴、彼此渗透，夷夏观因此而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较之从前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。这一结果虽然并不是赵武灵王改革的本意，却成为胡服骑射最大的成功。历史证明，中华民族的发展得益于此。”《胡服骑射与华夷之辨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，2009年第6期。

^[8]参见华盖《“胡服骑射”与“全面汉化”——赵武灵王和魏孝文帝的改革》，《沧桑》，1995年，第3期。